

## 教育革命

# 请看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

江 云

下面选登的几篇有关苏联教育史方面的译文，特别是《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苏联教育史》一文，值得大家一读。这篇文章，在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辩护过程中，曲折地透露了从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教育界先后发生的两次大辩论的若干情况。如果剥去这位作者披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细细一读，是很能发人深醒的。

十月革命的年代，是急风暴雨的年代，革命狂飙席卷着俄罗斯大地，洗刷着资本主义的一切污泥浊水，也冲击了教育这一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亲自领导下，教育领域中的革命新生事物蓬勃涌现：废除教会特权，清除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废除旧学校的等级制度、民族限制和男女不平等；缩短普通学校的年限；废除考试制度；创办七年制工厂学校、工农速成中学、青年农民学校等工农学校；发动群众监督和管理学校教育；等等。这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向资产阶级的宣战。然而，资产阶级及其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决不肯轻易退出他们长期盘踞的教育领地。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爆发了一九一八年的苏联第一次教育大辩论。

辩论是围绕着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大会

需要制订一项改革教育的“统一劳动学校”的规程和原则。提交大会讨论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莫斯科代表制订的，一个是彼得格勒代表制订的。莫斯科草案制订者的一派认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生产劳动是统一劳动学校的基础”必须从根本上“打倒关门的学校”。而彼得格勒草案制订者的一派却认为，生产劳动只是“掌握普通科目的一种教育手段”主张继承、保留“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的遗产。在克金克拉泽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场辩论是进行得相当激烈的。在大会前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定稿委员会上，彼得格勒派处于多数，但是到了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代表们普遍欢迎并通过了莫斯科派的方案。文章的作者把这归之于莫斯科派利用代表们对沙俄学校棍棒教育的仇恨心理，以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辞句骗取了代表们的信任。这是卑鄙的伪造历史。事实上，正是由于列宁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痛斥了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才煞住了彼得格勒派掀起的第一次复辟倒退妖风。

经过第一次阶级力量的较量，资产阶级的气焰稍为收敛一点，但是，当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教育领域的右倾翻案之风又刮起来了。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以后，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更为猖獗，并终于导致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苏联教育界的第二次大辩论。这次大辩论是围绕着如何估价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而展开的。那个时候什么“学校消亡论”啊什么“无政府主义”教育啊什么“实用主义”教育啊什么“对遗产利用态度不正确”啊……，一叠一叠的帽子飞向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人的头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无产阶级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充分肯

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克鲁普斯卡娅明确指出：“右倾分子是无论如何不会摆脱旧的一套的，他们对新鲜事物都深表怀疑，他们紧紧地抓着旧尺度不放”；“想把学校往后拉”。这次辩论是以一九三一年为“转向”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而结束的：提出“为掌握基础知识而斗争是学校工作中的决定性环节”法定“正规化的教育大纲”；“系统化的知识范围”确立“班级授课制”，严格“按课程表办事”严格“考核制度”确立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等等。经过这次辩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在苏联占了上风。克金克拉泽在文章中谈到这一段历史时，真是绘声绘色，他认为苏联的“科学”的教育史，就是从三十年代初期才开始的。

三十年代以前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它说明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教育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

教育，这是一个培养接班人的社会领域。无产阶级懂得这一点，资产阶级也非常懂得这一点。因此，当资产阶级丧失政权，丧失生产资料以后，必然要在教育领域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以此作为复辟的重要阵地。列宁非常关心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坚决主张废除“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的旧学校。当年，他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青年团的任务》）可是由于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情况却大变了。列宁在世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现在的这一批主要头目，当时还多是一批十四、五岁的少年。不言而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对于产生这批毒果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教育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

性，还在于教育领域历来是剥削阶级盘踞的世袭领地。剥削阶级在这里长期经营，盘根错节。几千年的影响，短短几年、几十年是改不过来的，要经过几代人的斗争。因此，我们对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必须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是斗一次、二次、三次，而且要准备斗它十次、百次，直至斗到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影响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为止。

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也说明，教育战线上的斗争决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是整个社会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同经济领域的斗争息息相关。一九二五年，联共（布）召开了十四大，提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坚持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还是推行“技术第一”、“专家至上”、“物质刺激”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当时苏联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攻击列宁的教育路线，否定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也正是以工业化需要培养专门人材为借口的。这种借口同苏联经济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谬论完全是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

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还说明，要不要彻底改造旧学校，教育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教育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它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驯服奴才，工人的子女在那里受教育，实际上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十月革命以后，在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苏俄广大师生走出校门，到工厂去办学，到农村去办学，同工农相结合，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这个大方向是完全对的，这是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革命行动。资产阶级及其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暴跳如雷，恣意攻击，也不足为怪，因为这触及到了他们的要害。苏联三十年代以前的两次大

辩论告诉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教育革命的根本，决不允许转向。

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还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要向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进行反扑，总是首先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一直胡说二十年代的教育制度是“劳动太多”把教育“搞乱了”；学校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质量太差”，他们甚至还以学生的错别字来证明教育改革“搞糟”了。

什么是教育质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个人即使文化再高，如果方向不对，不仅无用，而且对社会有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经过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 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教育革命怎么搞，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从儿童时期起，每天劳动两个小时，以后增加到四小时、六小时 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但是 教育要革命 这是无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历史使命。不管前进的路上多么崎岖曲折，这个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完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个真理，不论对中国无产阶级，对苏联无产阶级，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是适用的！

# 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 苏联教育史

(苏) О·Д·克金克拉泽

苏维埃教育学史，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年）在这个时期要谈论作为一门科学的苏维埃教育学，还为时过早。

第二时期（一九三〇至一九五八年），是科学的苏维埃教育学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时期。

第三时期（一九五九年以后），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苏维埃教育学发展时期。

##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过去由国民教育部执行的全部职能，改由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来完成，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教育人民委员 А·В·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颁布了列宁签署的关于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后来取消了阶层和民族的限制，消灭了原先在国民教育领域中妇女所遭受的权利不平等现象等等。

就这样，对国民教育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制订学校体制的总的原则和理论工作，就由国民教育委员会来承

担。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里，批判旧的教育理论、原则和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教育问题，这些工作就全部由国民教育委员会承担。

有两个基本因素促使能够比较迅速地、在很短时期内成功地拟订出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总原则：（一）在列宁的著作和十月革命前党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国民教育的基本方针已经提出来了，共产党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政治路线已经确定了，新学校的建设道路也已经指明了；（二）为改革学校工作所必需的教育研究任务和具体的改革工作，都由一个中心领导。

一九一八年夏天，举行了三次国民教育方面的代表大会。六月二日到六日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六月五日，列宁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会议的参加者表示祝贺的同时，列宁号召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要把这一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过了一个月，七月三日至八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俄教师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将进步的教师力量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周围起了重大的作用。大会的参加者痛斥了全俄教师联盟的反革命活动，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号召教师脱离这个反人民的联盟，参加到国际主义教师队伍中来。从一九一八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四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研究了学前教育、学校体制和成年人的校外教育等重要问题。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充满了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的气息。列宁指出：“国民教育事业是我们目前斗争的组成部分。”列宁谈到了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本质，谈到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是在革命斗争中受到了完备的教育，还谈到学校不能脱离生活，脱离政治。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充分发挥了关于学校和生活

相联系、和共产党的政策相联系、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相联系的列宁主义原则，对理解苏维埃学校和苏维埃教育学在新社会的作用和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是苏维埃教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代表大会审查和通过了国民教育委员会制定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草案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

应该特别强调，A·B·卢那察尔斯基，特别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制订新的劳动学校的基本理论原则方面起了最显著的作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按照A·B·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在当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首脑人物，她的学说包含了“新教育学的核心”。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都是以党对国民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纲领性要求为出发点，并按列宁的指示和建议办事。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研究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观点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得出了一些关系到未来的结论。她指出，劳动学校不能够建立在读书学校的原则基础上，劳动学校要求个性化，要求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性，劳动学校要求新的方法和新的教师并以教学和生产的紧密结合为前提；她指出，把读书学校改造成为劳动学校，就要改组国民教育工作的整个组织。

在《规程》和《劳动学校基本原则》通过前不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最高目的》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她谈到了有关教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Φ·Φ·卡拉廖夫在其《苏维埃学校和苏维埃教育学史论文集》中指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从根本上改造学校的准备工作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她阐发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原理：

“（一）资产阶级学校的中级和高级阶段，只是为有产阶级的子女开放的。与这种学校不同，无产阶级的学校应该是真正的人民的学校。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准则的苏维埃政府，应该立即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使各级学校为各阶层的居民开放，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二）资产阶级学校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在为劳动人民子女开设的低级学校（小学）中，它的使命就是‘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熏染学生，削弱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成为一群易于指挥的听话的人。与这种学校不同，社会主义学校应该成为全面教育和发展个性的工具，。

“（三）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共同目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完整世界观的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培养能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会建设理性的、丰富多采的、美好的和愉快的生活。‘这样的人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没有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完全实现’。

“（四）为所有人所设立的第一级学校，主要应具有实践的性质。应广泛地采用教育的劳动原则，增强孩子们的社会观点并训练技能。第二级学校招收这样一些年龄的孩子，他们能把所得到的印象充分接受、进行加工并系统化。这类学校应注意帮助正在成长的一代的世界观的形成，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他们，给他们指出运用所获得的知识的方向。

“（五）与压抑学生个性并使之发生畸形变化的旧学校相反，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学校，不应压抑学生的个性，而应帮助个性的形成。‘但是，在帮助形成个性时，学校应该做到使学生能在公益劳动中显示出这种个性’。

“（六）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学校最重要的

原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道：‘现在很多人在谈论劳动的方法，但是在社会主义学校中，不仅要采用劳动的方法，而且要把儿童的生产劳动加以组织。社会主义者反对剥削儿童的劳动，但他们当然是赞成儿童力所能及的、全面的和逐步加强的劳动的。生产劳动不仅能把孩子培养成未来社会的成员，而且能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孩子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是有巨大教育意义的。’

“（七）目的的统一决定着学校的统一。学校应该是统一的。但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读完完全学校。‘国家未必能够，至少在初期未必能够保证全体公民都有可能学习到十七岁。因此必须把学校分级。’

“（八）为所有的人开放 对所有的人一致 能保证个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学生的个性，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学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才可能有。当社会建立在划分贵族和非贵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学校就没有任何的立足点和基础。

“（九）当现代中学的目的尚未改变，同生活脱离的现象还未消除，当这种学校还继续培养贵族老爷和特权阶层时，即使完全免费，它对广大群众来说也是格格不入的。”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 A·B·卢那察尔斯基把学校看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他们为科学的苏维埃教育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 第一次教育大辩论

这样，当国民教育委员会大规模地开展对学校改革的理论研究时，一些基本的原理都已经成熟了，这对准备实行学校的社

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宝贵的贡献。尽管如此，就《规程》草案的某些问题，还是向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文本。这是由于起草这些文件的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问题是，有关改革学校问题的研究工作，不仅在莫斯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革处中进行，同时也在彼得格勒北方省公社联合会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中进行。两个人民委员部都是由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的，但是草案的起草准备工作仍然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这两个草案的基本区别就在于，根据莫斯科草案，生产劳动是统一学校的基础，而彼得格勒草案则将劳动视为掌握普通科目的一种教育方法。毫无疑问，彼得格勒人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国民教育委员会委托 A·B·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B·П·波焦姆金、B·P·曼仁斯卡娅、П·H·列别申斯基、B·M·波兹涅尔和其他一些人，为《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定稿。在这个委员会中，莫斯科草案的作者和支持者处于少数。委员会将草案的最后定稿，提交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讨论。然而在代表大会上，П·H·列别申斯基和 B·M·波兹涅尔，仍然坚持被定稿委员会所否定的莫斯科草案中的那些条款。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A·B·卢那察尔斯基作了十月革命后教育人民委员部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他强调指出，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研究工作是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同时他又指出，《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的制定是人民教育委员部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成就。为了捍卫草案的基本论点，A·B·卢那察尔斯基说：“我们把劳动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也即作为一种对技术的充分的研究。我们把劳动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我们才能够培养性格的种种特点，

这些性格特点使个性经久不变和富有价值，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为劳动就是少年儿童参加到居民所从事的共同劳动中去。”

(A·B·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这个思想曾作为 A·B·卢那察尔斯基所领导的彼得格勒派所制定的草案的基础。根据这个草案，学校、课堂、学科、班级、家庭作业都保留了下来。这个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的许多发言和文章中，都坚持了建设社会主义学校的党的原则。他认为，学校应该是劳动的学校，学校中的教学应该具有综合技术性质，但不是那种常常被错误理解的狭隘的职业性质。

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莫斯科草案的代表，它的作者之一，莫斯科派的领袖 П·И·列别申斯基也做了报告，主要是揭示了“劳动学校”这一概念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一方面阐述了委员会所通过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又坚持莫斯科草案中关于公社学校和全日全年学校等等条款。这个被 A·B·卢那察尔斯基公正地称作无政府主义的草案，实质上要求用“儿童生产公社”来代替学校。按这个草案作者的意见，公社学校应该全年工作，一个星期中没有休息天，一天的工作时间也不受限制。打算不再分年级。总之，连大纲也认为是多余的。П·И·列别申斯基在自己的报告中，企图发挥教学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思想，但是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主义。在为建设新学校探寻途径时，他未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П·И·列别申斯基不正确地解释了劳动、学校的社会活动、自我服务等等的意义，使这些活动在学校生活中所占比重过大。当一九一八年初党派他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工作时，他的这种错误立场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一九一八年四月，他以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身份领导了学校改革处。还是在一九一八年秋天，П·И·列别申斯基就在白俄罗斯利特维诺维奇农村建立了第一所苏

埃实验公社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搬到莫斯科，成了莫斯科列别申斯基实验公社学校。这个公社学校中的课程就是根据这样的原理开设的：学校研究的主要题目，应该是人类社会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劳动。

莫斯科草案和彼得格勒草案的作者们，从不同的立场来确定教学各个阶段上的教育内容，对于解决组织学校教学活动中的一些其他问题，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原则上也是各不相同的。

经过激烈辩论以后，大部分与会者不顾被指出的错误，还是同意了莫斯科草案。最后，大会通过了一个包含一系列错误论点的草案。例如，《学校工作的基本方式》这一节的第十二条写道：“生产劳动不是作为一种支付孩子们生活费用的手段，也不单是作为一种教学的方法，而正是作为一种公益的生产劳动，它应该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础。”接下去在《学校工作制度和条件》这一节中的第十七条规定：“不允许上必修课和布置家庭作业”；第十八条“学校中禁止任何的惩罚”第十九条“入学、升级和毕业考试一律取消”；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条款。

应该指出，当时所特有的那种对以“必修课”、“惩罚”和“考试”为特点的革命前的旧学校持否定态度的普遍倾向，反映在人们对莫斯科草案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错误论点的支持上。沙俄资产阶级学校所推行的那套机械训练、呆读死记和严厉的棍棒纪律，使人记忆犹新。因此，一切外表和旧学校相似和令人想起旧学校的事物，在那时都要引起强烈的反对。根据我们的看法，这就说明，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由于看出了莫斯科草案已摆脱了革命前学校中“教育工作的普遍组织方式”，而同意了它，并且支持了这个草案中所表达的一些错误论点。与此同时，这是寻求教育的崭新途径和方法的年代，是进行试验的年代，而这些试验远远不是经常能够成功的。由于评

价教育学的古典遗产和利用旧学校积累的经验的态度的态度不正确，就使教学过程受到了破坏，而且造成了教学方法运用上的混乱现象。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代表大会的进程和工作总结，但是，这次大会毕竟在苏维埃教育学和学校的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国民教育委员会通过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并呈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批。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两个文件都刊登在《全俄执行委员会公报》上。《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后来称作《统一劳动学校宣言》。这个文件好象是《规程》的说明书里面的基本条款和章程文件一样阐述得很简短，没有论证和解释。《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和《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在苏维埃学校的历史上和对新型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形成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苏维埃教育学的奠基者们的集体劳动的总结，他们对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理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还包含了对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的一系列指示：(1) 有一定教育内容的智育：“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 所有这些教学的课程不仅允许创造性的、积极的教学方法 而且要求运用这种方法”；(2) 德育：“教育性的学校 如果可能 应努力消除儿童心灵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人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学校在培养儿童们迎接未来的同时，应努力从小学开始就组织起一个个坚强的集体，最大程度地发展儿童们追求共同感情和团结的能力”；(3) 美育：“美育指的不是教授某种简单的儿童艺术 而是系统地发展感觉器官和创造能力”；(4) 体育教学；(5) 劳动教育 还规定了“通过劳动熟悉孩子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

(6)综合技术教学，通过综合技术教学，学生应该熟悉了解一切最主要的劳动形式的劳动方法。

在《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中，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培养自觉纪律的问题，学生和教师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制定《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时曾确认“培养新的教师”意味着新的学校建立了一半，意味着促使新的民主制的建立”。因而，原则上全新的学生自治问题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学生自治，在解决学校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化这一共同任务中，处于极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的作者们认为“儿童应该参加学校的全部生活”。与此同时，作者们还指出了实现这一要求的途径“；为此，他们应该运用自治权和表现出经常的积极的互相帮助。在准备成为国家公民的同时，他们应该尽可能早地感到自己是自己学校的公民”。还指出了学生的学校自治的形式。这些形式分为三项：(1)“学生参加学校的各项管理委员会”；(2)“纯粹的各种学生班级的自治”；(3)“组织各种社团的充分自由，如科学小组、墙报编辑部、政治讨论会、展览会、体育团体、戏剧团体、合唱团、乐队等等”。

《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和《统一劳动学校规程》也包含了一些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特点所造成的错误观点（选举教师，取消考试和其他等等）。但也有一些受到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学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理论”影响的论点。这就是承认劳动是教学的基础；不正确地解释劳动和教学中的科学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综合技术教育不够理解；等等。

在确定新学校创立途径的最初文件中，这些和其他一些错误论点仅仅是局部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影响。在这些年代中，这些影响表现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活动中。而正是他们，制定了新

学校的建设原则，因为他们身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改革处的负责岗位。

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纲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民教育方面的新任务规定如下：“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国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是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同时，党纲还作出了为解决所面临的任务的具体指示：

“(1)对十七岁以下的所有男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2)建立学龄前的教育机关网：托儿所、幼儿园、日间托儿所等等，以改善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3)完全实现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各项原则：在学校中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使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4)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以膳食、服装、鞋袜及教材和文具。(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育工作者。(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7)国家全面协助工农自学自修（建立校外教育机关网：图书馆、成人学校、民众文化馆、大学、训练班、讲座、影院、艺术工作室及其他等等）。(8)对十七岁以上的人，广泛地发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俄罗斯共产党党纲中提出的

关于教育目的的经典论述，确立了苏维埃学校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目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中，是要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要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

一九二〇年十月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在列宁的教育学遗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苏维埃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意义。这本书是列宁对他有关教育、学校问题的基本观点的一篇总结。这是一篇包含着多方面内容的著作，研究了有关苏维埃教育学的下述各项重大问题：关于教育和学校的阶级性质，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关于智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的教育。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举行的第一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专门讨论了在新的条件下学校发展的道路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学校或儿童之家，哪一个应该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本环节？经过激烈的辩论，会议决定改变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沿用的一级和两级学校的体制，创立七年制学校，把它作为普通教育学校的基本形式和在和平建设条件下已经改变了的新型国民教育体制的基本环节。

## 第二次大辩论

苏维埃的恢复时期即将结束。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要进一步发展工业。党采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样，对具有中等和高等专业水平的专家，以及对具有适当的普通和技术知识水